

作者对后马克思主义当中较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做了批判性考察。她不满于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分离出去的做法，详细阐发了她本人对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创造性理解，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一针清醒剂。本书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在本书中观察问题的视角及其研究方法，对于探讨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发展路向不无借鉴。

新 社会主义

(加拿大) 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如果一个政党打算从事权力的斗争，同时充当群众动员和意识形态改造的工具，如果它打算追求当权的目标，同时又能推进社会主义的斗争，那么，这个党只能首先是一个围绕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起来的“阶级党”，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导引。

现代政治译丛

新 社会主义

(加拿大) 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200098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社会主义 / (加)伍德著; 尚庆飞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11

(现代政治译丛/吴源主编)

ISBN 7-214-03086-1

I. 新... II. ①伍... ②尚... III. 新左派-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334 号

Retreat From Class

Copyright © 1998 by Ellen Meiksins Woo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0-063 号

- 书 名 新社会主义
编 著 者 (加)艾伦·伍德
译 者 尚庆飞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2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86-1/D·486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再版导言

任何一位作者在重读自己 10 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时,都会有些许不安,尤其该作品又是在特定的政治情形之下,作为对某种特定而又稍纵即逝的思潮的一种回应而完成的。因此,这一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陈述或判断上存有缺憾。一些当时看上去很重要的批评与主张很可能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断裂,或者说是当今最大的时代性转换之一——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使得距离感似乎更为强烈。

《新社会主义》一书是其时代的产物。然而,我认为该书对已然衰亡的思想倾向所做的批判性评述在当代仍然是有意义的。该书意欲对阶级、意识形态、政治、社会主义与民主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比当时更为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进行理论反思。我认为,即使是作为思想史,该书的重要性也已超出了它的主题。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许已成往事,但其原初意旨在今日之学术风尚中仍具活力。我认为本书可谓已从整体上把握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

就表面而言,从 1986 年起,特别是 1989 年以来,左派学术生活变化较大。比如,在《新社会主义》一书最初发表时,“后马克思主义”一词不过正处在形成之中,今天,这个词却已经几乎无法指认。曾经用这些术语描述自己观点的人现在可能会——至少是在其原初意义上——拒绝那样的一种自我勾画。毕竟,在此术语生成之初,尽管它的阐释者们认为自己已经游离其外

了,但它仍然意欲表明:他们共同源起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今天,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几乎是让人无以察觉。人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朝着与马克思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除了拒绝和否认之外——几不相关的方向游移。一切似乎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

尽管如此,把这一变化的轨程完全或主要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是不当的。因此,过分夸大这些事件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学术与政治所发生的“变化”是错误的。在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有一种不可打破的连续性。他们共同强调“话语”和“差异”,或者是现实的碎片化本质以及人类的认同。这些连续性,如果是确实存在的话,与那些“变化”比起来则是更为显著的,且其源皆可深溯至50年代和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先知”们思想形成的时期。

为了正确地描述这些连续性,让我们首先对“变化”进行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造性矛盾在于,尽管这些人极力强调“差异”,坚决拒绝“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以及阶级政治,但他们仍然会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某种无所不包的而且不伦不类的普遍性政治目标公开表示认同。由于如此众多的“差异”的存在以及诸如“阶级”之类的统一社会基础的缺乏,这些普遍性目标迫使后马克思主义者去依赖非常抽象的、非决定性的社会政治原则。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概念,本意是试图替换传统的社会主义设想,现在却不得不用非常模糊的措辞去加以界定,以服务于没有共同基础的“不同”的解放目标。

无论如何,“激进民主”中的“民主”一词总是极为模棱两可的。悲观一点看来,因为缺少某种社会基础,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教义,要求知识分子扮演一个非同一般的重要的政治角色。后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诺的真实的民主斗争——比

如反抗种族或性压迫——将被话语分析的学术政治所遮蔽。乐观一点说，“激进民主”的社会非决定性使其在政治实践中苍白无力。对于其全部的“反普遍主义”而言，这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比起其欲取而代之的“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只能是过多地具有抽象统一性，而较少地具有社会历史的具体性。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转换。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但是，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借助于“散裂”^{*}和“差异”，多多少少决定性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在这里，对于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原教旨主义”^{**}、“理性主义”或“启蒙方案”都不再心存留恋。其最终结论不仅是拒绝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别的“普遍主义”政治，而且连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本身也一并予以否定。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事实上，很难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像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叙述一样模糊的一个政治原理，在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全部的政治基础之后仍然能够有效？

尽管存在这些表面上的转换，存在近期来的历史性断裂，然而，在“苏东解体”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学术风尚之间的“连续性”比起“变化”来说却是更为显著。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不过是加快了在 60 年代就已启动的知识进程而已。

60 年代好战分子属于漫长的战后繁荣期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经成熟起来的一代人（在这里引用我本人在《新左派及其

* 或“碎片化”。——译者注

** 或“基要主义”。——译者注

后继者的年表》或《现在谁是过时的?》(《社会主义文摘》1995)里用较长篇幅说明的一个观点。),他们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由此也要比他们的后继者更为模糊。第一代新左派在其形成时期经历的主要是战争与萧条,年轻一代的新左派,崛起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拥有对于资本主义常态的非常不同的感悟,他们毫不犹豫地反对“体系”,深深地执迷于表面上的成功。对此新的现实,当然存在着广泛的理论回应。但是,消费资本主义深入到学生运动(在像马尔库塞这样的思想家的影响下)当中去所形成的霸权性支配,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支配,已经一劳永逸地淡化了旧的反抗性组织。从此,阶级斗争的“古战场”上硝烟散尽,往昔的差异与分立在开放时代自由思想交流的浪花里无影无踪。

60年代末70年代初,工人阶级斗争性在几个国家里的迸发或许已经动摇了那种信念,而且他们确实也为“黄金时代”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然而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他们也将成为成熟的学者)仍然认同于一个不变的思想:即学生和他们的思想导师们将不得不去填补由学生运动所遗留的历史空白,而且,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要么是被“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取代,要么是化理论为“物质力量”。

伴随着某些调整与修正,尤为重要是“阶级”从“阶级斗争”中的消失,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到“话语”的学术政治这样一条不间断的线索,把60年代的学生激进主义的几条线索与今天的学术风尚(而且甚至是把种种西方学生运动中的毛主义倾向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从“文化革命”到文本解构)连接了起来。在从此至彼的这样一条演化线索中,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后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倾向。

不管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60年代青年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反抗力量,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在新的后左派理论中,资本主义无可替代,阶级政治所拥有的空间比起在后

马克思主义中更小。因此,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一种始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强烈反抗性冲动的思想倾向,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缺点与矛盾冲突自大萧条以来最为暴露无遗时,向资本主义投降了。更甚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如,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展现出新的面貌;人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开始走上街头。然而,当前新左派对此却毫无准备。

欲判明这些历史演进会对今日之学术风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为时尚早,但最近爆发的“阶级斗争”(同时,“差异”与“政治认同”这些宣言在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具有越来越少的吸引力,还有就是,受物质条件和阶级的影响,种族与性的压迫方式更为明显)或许会有助于说明近来潜入后现代话语的某些“自醒”。有迹象表明,今日学术名人堂中的一些领风人物——比如,雅克·德里达、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里查德·罗蒂、朱迪斯·巴特勒——正愤怒于那些由反普遍主义、反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强加的种种理论与政治的约束。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这是一个创新的时刻。此时此刻,为什么要退回去围绕已然消逝的或已为人遗忘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去呢?其中一个答案是,这将有助于沿着当今已入僵局的后左派政治思想回溯至其关键的转折之点,在那样一个把阶级,连同社会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我们的视线中拖走的转折之点之前,这些争论至少在当时仍然是关于阶级政治的。如果说,现在更新我们关于阶级和阶级政治的思考之资源具有某种紧迫性的话,或许那样的一个转折点倒是一个不坏的起点。

艾伦·麦克森斯·伍德
于 1998 年春

目 录

再版导言	1
第一章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1
第二章 通向 NTS 之路:阶级斗争及工人阶级的移置	12
第三章 先驱者:尼柯斯·普兰查斯	25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自主化	46
第五章 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	75
第六章 政治与阶级	91
第七章 非相关性原则:一个历史个案	104
第八章 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	118
第九章 社会主义和民主	132
第十章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142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与“普遍人类之善”	169
第十二章 结 论	182
索 引	204
译者附记	215

第一章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种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术流派给予了强有力的驳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某些幻想信以为真……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的基础上去……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的热情,而是宣扬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了。”^①“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们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引起的,那么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般还谈论社会。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②在《共产党宣言》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被概括为:既然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满以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 译者补。

**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译者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好像目睹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复苏。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下使用缩略语 NTS 代指“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实质上是将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这一思潮最明确的特征是使意识形态与政治脱离任何社会基础,特别是任何的阶级基础。与此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条件自然导致政治力量的产生,为其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 NTS 则认为,由于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可能并不具优先性地位。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状况来促成,不是由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这些理论策略有效地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NTS 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并以不同的理论风格被表达出来。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是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比如,包括 E. 拉克劳,巴里·汉迪思,保罗·赫斯,以及 G. S. 琼斯。在英语国家中,NTS 的一个主要的理论阵地是《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这是英国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刊物。NTS 在理论与政治上与大陆及英国“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已经建立起了从共产主义者到工人党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并在大西洋两岸都找到了其阐释者和代言人。

在某种程度上,NTS 可以被当作是所谓的“新修正主义”^③,但也必须对此明确加以区分,希望能弄清的是,被“新修正主义者”用来支撑自己政治观点的精致的理论公式——尽管他们也

声明那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代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背离,实质是对其本质前提的抛弃。总而言之,“新修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共同政治原则的思潮。这些原则拒斥了阶级政治的首要性,寄希望于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对于 NTS 来说,这些政治原则需要对社会现实,至少是使其得以解释的理论构件彻底地作一个重新评估。同样可能真实的是,那些支持了这种理论反思的人,一般都属于新修正主义者的“极右翼”,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界定,对其“同志”来说则是过于极端化的。这或许意味着,右倾的幅度与理论的精致性、复杂性(更不要说其虚伪性与模糊性了)程度是直接相关的。无论如何,当前研究的主要对象将会是这一思潮的某个部分,这不仅有助于理论的重建,而且将可以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来对这一思潮加以准确界定。

不管这一运动是多么复杂,不管其全部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能认同于相同的原则,但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

(1)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必然产生一个相应的政治力量;

(2)这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阶级与政治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偶然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与政治是(相对地?绝对地?)独立于经济的(阶级)关系之外的,不存在建基于诸如“经济”的阶级利益之上并能被转译成政治话语的东西;

(3)这些问题尤其是表明了这样一点,即,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或特定的联系,而且,工人阶级在实质上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兴趣”;

(4)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



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成可以多多少少独立于经济的(阶级的)条件,这尤其意味着以下的两种情况:

(5)一种政治性力量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由能够联结在一起的、并由纯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动的各种式样的“人民”因素建成,而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6)确当的社会主义目标一定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我们可以在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把这些目标向不同类型的人们加以述说,而不管他们物质阶级境况如何;

(7)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它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在一起。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用“激进民主”的说法来置换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可以的。社会主义多多少少可被说成是自由民主的自然延伸;或者,无论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民主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但它还是体现了“非决定性”的原则,能够被拓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NTS首先便是以此种形式存在,并在像塞缪尔·鲍尔斯和赫尔伯特·金蒂思等人那里得到了精致的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不再重要,这不仅代表了社会主义目标的重新界定(这一目标不再能与阶级的消亡相一致),而且是拒绝对关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明显,整个这一论断的逻辑要求把物质生产降低为至多不过是社会生活构成中的次要性因素。由于社会主义方案与任何特定的阶级相脱离,它在“人民同盟”这一社会集团中被重新定位,其角色认同、聚凝的原则、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而是由它们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因此,NTS作了这样的假定,即存在着并非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活状

况的历史性力量,存在着这样的集团组织,它所声称的具有战略地位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物质生活的社会组织中没有根基。更确切地说,战略性力量与集体行动能力的拥有,并不被认为是确定社会改造的动力因素的本质标准。

极端一点而言,使意识形态与政治“独立化”的理论倾向,是与那种把语言和“话语”建构当作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原则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关,某些“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后结构主义的合拢,最终使意识形态与观念同任何社会与历史基础相分离。这种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语言,迂回反复以至最后的虚无主义的做法的不足之处,已经遭到了佩里·安德森深刻揭露与批判。^④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思路是如何被运用于这样一种政治策略中去,这种策略认为,社会和政治力量是由话语本身构成的,在社会关系中几乎没有基础。

因此,NTS方案的实现似乎要寄希望于一个宽泛而松散的联合体,在联合体的内部,除了大都是来自于一种起源模糊的独立意识形态之外,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新的“真正的”的社会主义者们看上去一致认可下列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者是那些所谓“公平正直”的人,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在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层面之上,而在于他们对理性与言说的敏感性。尤为特殊的是,知识分子试图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即使在不够显著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认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必定要在其社会主义方案中,赋予知识分子以决定性的角色,因为这一方案要依赖于知识分子去完成,而且,这一任务是相当重的,不会比通过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方式去建构社会动因更轻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他们的知识分子领袖——话语的载体——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外,由尚未成熟的大众构成的“人民”主体仍然不具有集体化的特征和组织起来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补充一条最终原则:

(8)比较而言,某些类型的人对于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主义话语更为敏感,更能够认同于一般性的人类目标,更加明显地排斥狭隘的、物质的——或者常被边沁*称为是“邪恶的”——利益;这些人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注意到以理性、人道主义目标为一方,以物质利益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敌对——是极为重要的。)

至少,所有的NTS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并没有优先性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的阶级状况不比其他(阶级)更自然而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然而,有些人甚至会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或者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比起其他社会群体更不太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政治。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不具必然性,而且,其本质特征却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

然而,在这个论断中或许有一个矛盾。尽管根本原则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对于阶级的独立性,但现在看上去至少就工人阶级而言,经济-阶级状况确实是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只不过不是以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方式而已。这一判断如果能够成立,就必须依赖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经济状况本身决定了其他现象能够独立于他们的程度,或者去响应一个著名的阿尔都塞式的公式——经济在最终意义上具有决定性,只有在此种意义上,经济才是决定性或支配性的;而且,有些经济状况决定了经济本身将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其他的经济状况则决定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将是相对独立的或是占支配地位的。用传统的术语来表达,这个判断就是这样的,即,某些阶级条件决定了民众

* 边沁(1748-1832),英国作家、改革者和哲学家。系统地分析法律和立法,建立了功利主义学说。——译者注

将与物质必需联结在一起,而其他条件则允许更大的知识与道德的自由,换句话说,更能够拥有“正确的思想”,因而能够更敏感于社会主义话语。

因此,人们更乐于去选择社会主义政治,他们越是独立于阶级的物质状况,就越是具有去响应理性的、普遍性目标的能力。因此,工人阶级之所以并非最适合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选民,不简单是因为物质利益倾向于产生一种“经济主义”或者“改良主义”的政治,而毋宁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就是为物质利益所驱动的。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在一个经典的保守原则基础上被重构了,这种保守性原则可以上溯整个漫长的政治思想史,直至柏拉图式的反民主的哲学。但更多的关于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将在后面展开。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中的大部分是谈不上“新”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不过是旧调重弹,是老掉牙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骗人方案。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只需被“拓展”便可延伸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是那种关于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更高理想,且这种理想能够吸引所有“公平正直”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样的阶级)的想法将会得到比如说诸如 M. 拉姆塞* 和 J. S. 穆勒** 的认同。NTS 的新颖之处在于,其阐释者坚持认为,他们要么与马克思主义,要么与其后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即使那些(如 E. 拉克劳、C. 墨菲)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且已游移至 NTS 思潮的右翼极端的人,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他们主要的构成

* 拉姆塞·麦克唐纳。——译者注

**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其著作甚多,有《逻辑体系》(1843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译者注

性传统之一,只不过“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和有效范围……”^⑤。这些声明指出了这一思潮最具特色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它复杂的、虚伪的、捉摸不定的理论歪曲,与直白无饰的、不求精致理论包装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这种思潮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现在得以凸显,又何以能在英语国家找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生长点。当然,从广义上说,在过去的10年左右,它是对“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大潮,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正如拉尔夫·密里本德*在他关于“新修正主义”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已经在其他国家以更糟的和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在法国,已经产生的甚至不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而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与蒙昧主义”^⑥。英国的NTS当然没有考虑得这么深刻;从这种观点看来,它拒绝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背离——不管这种拒绝将会如何地误导——的做法可能被解释成一种肯定性的声明,以表达其对于某种社会主义价值的永久性承诺。然而,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根本立场的抛弃,这当然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NTS思潮形成发展的时期大约是在1976-1985年,尽管

* 拉尔夫·密里本德,生于1924年,自1949年起历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高级讲师、利兹大学政治学教授,现执教于美国布兰代斯大学,1964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纪事》的主编之一,在西方政治学界有一定影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他以国家为什么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个问题为研究重点,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具主义的分析。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国家政权与阶级利益》。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学说对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阐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作用和运行机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译者注